

---

# 关于中国城镇化与黔中地区城镇化的历史思考

范松<sup>1</sup>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要】:** 中国还在夏商之世便已经有了城市的萌芽, 以后的城市发展, 一直走在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上。然而, 在某些西方学者的眼中, 中国古代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如果就当今中国城镇发展的状况加以观察, 西方学者的论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忽视了城市发展的多种途径, 而我们对当今国家与地方城镇化的研究, 却不可陷入这样的误区。对于城镇化的历史演变, 只有从国家特色与地方特色这两方面去认真进行观察, 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关键词】:** 城镇化; 中国; 贵州; 黔中; 历史思考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7)07-087-092

## 一

厉以宁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一书的序《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一文中明确指出:“传统城市化是先进行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当时, 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是同步的, 缺乏统筹安排, 也没有科学的城市化规模概念,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城市领导层所考虑。等到发现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时, 已为时过晚, 要改变城市现状已经不易。后起的工业国家, 即使认识到城市化的弊病, 想避免, 但需要大笔公共投资, 往往力所不及。结果, 无论在先工业化或先城市化的国家或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 都发生了所谓的城市病, 即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城市中出现了棚户区或贫民窟, 环境恶化, 过分拥挤, 失业激增, 社会治安欠佳, 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 即穷人继续涌入城市, 富人纷纷迁离城市, 搬到郊区居住。”<sup>①</sup>

事实的确如此,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世界性课题。由于全球地理状况的差异、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 各地城镇化的途径存在着多种选择。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原因的研究, 提出“二元经济”模型理论, 推进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统计发展模式的多方面透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 国外学者开始综合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形式、城市化体系、城市化模式, 并依据经济发展水平把中国大陆划分为中、东西部三个地区, 对中国当前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展开探讨。上述研究对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前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委员、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认为:中国的城镇化, 无论官方如何看待, 这一点正在发生。但“在城镇化方面, 中国各个城市的成果将不均衡”。<sup>②</sup>

眼下世界对中国城镇化的关注度较高, 但迄今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城镇化的研究, 依旧有人习惯于套用或重复昔日城镇化

---

<sup>1</sup>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喀斯特地区黔中城市群城镇化历程研究”(15XZS011)

作者简介: 范松,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贵州城市史。

---

的理念。他们忽略了用以观察中国的城镇化理论，实际上仍在运用上世纪曾风行一时的传统城镇化观念。世界如此复杂，岁月又在飞逝，东方与西方，18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与21世纪的工业现代化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传统城镇化的概念，对于今天处于东亚的中国来说，可资借鉴之处固然有，但却不能照搬照抄，一味硬套。这样做，甚至可以说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

城市化问题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其主编的《城镇化与社会变革丛书》中曾强调指出：“我们研究和积累对于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对于社会、对于各级政府、企业家、学者和媒体人来说，如何去理解城镇化问题，就涉及将来可能出台什么样的政策，以及相关问题如何落实”。<sup>④</sup>在谈到中国城镇化中进行国际比较问题时，他特别提到要研究制度下的差别，即要了解比较国家相互间制度演变的历史；要注意国际比较中发展阶段的差异；要比较资源供给的能力；要区分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差异等几个方面。

总而言之，讨论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与研究当代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一样，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对城镇近代化的过程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研究，都不能脱离“中国特色”这一基本要素。

## 二

中国都市发展的历程，由于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中央集权，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无论繁华的都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边远民族地区的首要城市，在城市的萌芽、发展、兴旺上虽各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但至少在19世纪中叶以前，城市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大体上是一致的。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著有《中国都市史》一书，书中认定，在中国，“早在商、周、春秋和战国时代，都市（城邑）已成为规定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即使在郡县、郡国和州县这种官僚制度形成之后”。斯波义信还概括指出：“在10世纪之后，府、州、县层次的都市周围发展出无数的‘市镇’，开始对农村产生深刻的影响，并由此成为近年来的乡镇问题的源头。总之，虽说过去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前工业化类型的农业社会，但其属于一种在框架内成熟并发展到极限类型的社会。”斯波义信的这一观点，建立在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入观察与分析的基础之上，是颇具说服力的。他在论及宋代之后的市镇时，很有自信地指出：“应该说，宋代之后贯穿元、明、清三朝的中国都市史是在宋代初成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过程。”<sup>④</sup>这一论断与笔者在《黔中城市史—从城镇萌芽到社会转型》中的看法，似可相互印证。<sup>⑤</sup>

在中国城镇开始迈向近代化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城市化、城市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有不少可资参考与借鉴之处，但用来分析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近代化的相关问题，却有许多是派不上用场的。

首先，虽然城市的近代化发展，无论东方或西方都需要工业革命性的推动，近代化的衡量也都体现在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经济领域上的工业化，思想上的理性化与科学化等方面，但两者实现的途径却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变革是自发的，由生产力发展后自然而然产生出改革社会制度的需要；中国近代的改革则是在外力推动下发生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导致了国家深刻的社会危机，统治当局不能不进行维新，这才有了清朝末年的维新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近代工业企业、邮电与交通的建设二说得明白一点，西方的近代化变革，主要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是事例。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化，一开始便是由清政府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就是很大的差异。

其次，在近代化问题上，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大多兴起于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这就是历史上工业革命的状况。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之后扩展到欧美各国。随着工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的进程，并带来了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与这种城市近代化同步进行的，是城市的公共管理模式。最初是发展出适合早期工业化发展的官僚管理方法，通过政府的社会管理与报务，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城市管理体制。<sup>⑥</sup>中国城市的近代化与之恰恰相反，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没有也不可能给予清朝统治者甚至后来的北洋

以及国民政府，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轻工业，只能从服务于军事的重工业，如钢铁、铸造、机械一类生产做起。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远远落后于其他省区的贵州，在清末会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兴建青溪铁厂这类工厂的原因。这种发展途径上的不同，必然导致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的缺失，以致许多中心城市，如黔中各市县，直到 20 世纪中期，都仍然未能建立起起码的公共服务设施。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除了前述因素外，中国城市的近代化与西方的不同，有着完全无法比拟的社会背景和基础。西方的近代化受到各种因素促进，其中除了以民间自发创办近代企业为先导，通过自由竞争发展资本主义外，列国在近代化进程中不断对外扩张，发动侵略和战争，通过对外侵略，建立殖民统治，从中攫取到大量财富，借助这种掠夺推动了自身的近代化的进程。而中国的近代化不仅是在外敌威逼之下被迫由统治者发动的，而且在艰难的起步中，总是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因而发展曲折而坎坷。除了民国时期近代化的进程多次被打断外，新中国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所推动的近代化，也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下，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变。

### 三

有学者在阐述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时，曾认为：“中国近代城市在其产生与发展中，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开埠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开埠前，即使是较发达的汉口、天津、上海等城市，也仅仅是国内货物的集散地，但开埠却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拉开了帷幕；‘因商而兴’是中国城市向近代化发展的基础，由开埠通商而产生的巨大商业力量，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中的新动力，商业功能日益成为近代城市的主要功能；由于兴办近代企业，使城市发展有了独立的经济保障和经济依托，从而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步伐。”<sup>⑦</sup>这一看法较为直接地指出了作为城市近代化的几项标志。

按照国外学者将中国城市分为中、东、西三部分进行研讨的划分，黔中城镇无疑属于西部地区，而且是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因而在近代中国，包括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黔中城市的近代化虽然启动得并不比其他地区晚，进展却极为缓慢。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学术界对黔中城镇的关注度，远远不尽人意。直到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人类受到伴随工业化而来的资源过度开发，污染与日俱增，生态逐渐失衡，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严重困扰后，人们才开始将目光投向这块位于云贵高原东半部的地区，并对其保存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诸多带有原生性的文化现象，展开观察与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涉及贵州城镇化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包括《贵州省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贵州山地特色城镇化研究》等。上述研究注意到了贵州经济、地理、民族、产业结构、人口、金融、服务体系等多方面因素，但对黔中城镇近代化历程加以专题探讨的并不多，更缺少分阶段剖析黔中城镇发展特点的论著，尤其关于城镇近代化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

近年出现了一些以当代贵州城镇化问题为对象的研究文章，如林颖艳等的《贵州城镇化发展研究》，指出处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的城镇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差距大约在 15 年左右。城市化水平的滞后已然成为了贵州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李靖的《贵州城镇体系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认为城镇体系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若干个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镇组成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李博田、超新取的《关于构建黔中城市群的一些思考》主要围绕提出黔中城市群的背景、构建黔中城市群的可行性研究、建设黔中城市群应注意的问题等展开阐述。邢丹、肖玫军、周焱的《喀斯特地区城市化空间模式和过程研究——以贵阳市为例》指出了喀斯特地区的城市化空间模式和过程有其独特性，主要受地形、交通、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该文以贵阳市为例，阐述了贵阳市城市化过程明显表现为面状城市化、线状城市化和点状城市化。在空间模式上呈组团式发展；在城市化过程上，部分次级中心区城市化速度高于中心区城市化速度等客观现状。苏维词、张中可的《贵州（喀斯特地区）城市化过程特点及其调控途径研究》，结合喀斯特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加快推进贵州城市化进程的一些对策措施等。上述文章虽然未就黔中城市发展的历程展开探讨，但它们的发表，对于下一步作者有关贵州其他地方城镇历史研究的课题将会很有助益。

---

当前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本质上是改革的深入，诚如李铁先生所指出：“因为城镇化要解决的是几亿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关系到利益结构的调整，所以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有关制度层面的问题。仅靠投资是无法带动城镇化的，否则只会固化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福利格局”。<sup>⑥</sup>类似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在城市近代化进程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总是就当今的城镇化论城镇化，或者只注重国外关于城镇化的经验与教训，忽略了中国尤其是具体地域曾经走过的城镇近代化的道路。

## 四

黔中城市的近代化正是基于特殊的喀斯特地区，加上西南边远民族山区、距离国家遥远等 3 种因素叠加的制约情景下一步行进的。这种过程也许会比世界上任何地区都要困难得多。这也正是黔中城市近代化遇到的坎坷特别突出，总是充满曲折，特别令人感叹的缘由。

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 80 年中，黔中城市的近代化历程经历了一波几折的激荡。大体说来，可以归纳为五个阶段。

其一，以青溪铁厂创办为肇端到辛亥革命前后，是贵州近代化进程的启动阶段。关于贵州的近代化进程，学术界一直存在仁者见仁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化不仅是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追求，而且是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观念等全方位的历史进程。它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在封建专制帝制的牢笼下实现。这种观点并以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成就了实现近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将贵州的近代化开启一直推迟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但给人的感觉却是过于将近代化偏重于政治方面。诚如笔者在《黔中城市史—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中所述，青溪铁厂的创建既是贵州城镇近代化的一种实验，又可视作近代工业在这片高原上的发端。该厂不仅从英国缔塞德厂购得炼铁炉和全套机器设备，雇有法国人罗克莱带队的 5 名外国工程师与江浙一带的一批技师，更以招股集资的方式募集资金，成为专制主义制度下思维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到辛亥革命前后，黔中地区已经存在不少的近代企业，其中既有帝国主义进行资本输出，在贵州建立的掠夺性矿产开采企业，也有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创建的民营手工业或近代机器工业。

其二，从辛亥革命到地方军阀统治终结的 1935 年，是黔中城市近代化从启动到迈出早期缓慢一步的阶段。在传统视野下，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包括北洋军阀、南方各地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如果就政治上的反动、军事上的频繁战乱而言，军绅政权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痛苦，无疑是十分严重的。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发生了近代社会经济的转型，民族资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统治当局采取了一些奖励实业的政策，鼓励新办企业，对厘金与捐税作了适当调整。这些政策对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工厂数量的成倍增加。民国初年，按照当时的标准统计，贵州各地较成规模的工厂仅 13 家，到民国 26 年（1936 年）增加到 1051 家，<sup>⑦</sup>20 余年中增加了 80.7 倍。其中，规模较大的玻璃、印刷、制革、造纸、发电等工厂均集中于黔中的贵阳、安顺、清镇等城镇。民国 15 年（1926 年）周西成主持黔政后，以贵阳为中心，开始发展贵州公路交通，兴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座发电厂，创建机制银元的造币厂，清理整顿财政。这些举措，不仅为省内的物资交流与经济联系改善了条件，为官僚资本与民族工商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对黔中城市的近代化也是一种推动。

其三，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随着沦陷区大批军事、民用工商企业，高等与中等院校的大批迁人，1937-1945 年成为黔中城市近代化的加速阶段。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时期从上海、南京、长沙、汉口、衡阳、江西等地迁人贵阳的大小工厂多达 101 家。各类工厂的资本总额从 1935 年的 60 万银元，增加到 1943 年的 14047.87 万元（法币）。贵州企业公司成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创办时即有筑东煤矿公司、贵州炼油厂、梵净山金矿、贵州丝织公司、贵州印刷所、贵阳建筑公司、贵阳电厂、贵州矿务局、中国国货公司等 9 家企业，到后来，通过扩张及对民族资本的吞并，发展到 34 家。抗战时期黔中地区，的工业不仅在企业数量和资本总额上急剧增长，产业构成上也出现了大的调整，开始显现出多门类、彼此相互联系的近代工业体系特征。加上这一时期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文化、卫生、公共事业的进步，为黔中地区的近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

民国 28 年（1939 年）出版的《贵州经济》一书，在谈到当时的贵州经济时甚至认为：抗战期间“因人才集中，凡百设施，亦得充分运用现代科学之利，是以对于民间产业之督促与指导，直接所营之种种经济建设工作，至少已向合理化方面迈进。故若复假以时日，则不久将来之贵州经济，未始不可与今日沿海各省之经济相媲美矣”。<sup>⑥</sup>

其四，抗战胜利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是黔中城市近代化从遭到破坏，恢复重建到曲折发展的阶段。抗战胜利后，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心东迁，重庆不再具有陪都地位，贵州作为抗战后方的作用相应下降，外省工业企业与教育单位陆续回迁原址。于是出现了“外来厂商纷纷离去，各项技术人才需要还乡，本省工业由战时的繁荣而转入战后的萎缩”<sup>⑦</sup>的情况。1949 年 n 月的贵州解放，既揭开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也为黔中城市带来了新生。由那时开始，黔中城镇的发展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经过长达 3 年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随着没收官僚资本任务的完成，加上一系列的清理整顿、改组改造、新建扩建举措，到 1952 年，贵州的近代化进程不仅开始得以延续，更被赋予了新的发展基因。到 1952 年，黔中贵阳、安顺及周边县镇的经济都有了快速发展。包括贵阳电厂、贵州烟厂、贵州玻璃厂、贵州水泥厂、瓮井煤矿等全省主要的国营企业大部分集中于黔中地区。“一五”计划完成以后，黔中城市的近代化已经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为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后来诸多违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瞎指挥、浮夸风，尤其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黔中经济的近代化建设产生了严重阻滞，导致了发展进程中的曲折。这种情况受全国的局势所左右，并非缘于贵州本省或黔中自身的因素。

其五，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在 1964 年至 1978 年间，展开的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工业体系建设。这场建设给黔中城市的近代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带给黔中城市的近代化进程空前的发展机遇。三线建设时期，成为黔中城市近代化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黔中城市，通过服务于三线建设的公路、铁路、航空方面的建设，极大地改变了黔中城市的闭塞状况，增强了黔中地区城市工业间的相互联系，开拓了黔中城市与省外尤其是内迁厂矿所在地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单纯依靠自身内力迈向近代化的发展模式，提升了城市的通道地位，加速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正是由于三线建设的进行，昔日贫穷落后的山区中心城镇，逐渐向着以工业生产为重点，服务于大规模国防建设，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逐渐加强城市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发展周边农村经济、活跃商业贸易的新型近代化城市综合体目标迈进。

## 五

纵观黔中城镇的近代化历程，不能不说充满了艰难与曲折。导致这种景况出现的原因很多，既有贵州省以及作为省会核心地区的黔中城镇自身的因素，又有国际、国内等大环境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 20 世纪初到该世纪的 80 年代，人类虽然在多极化世界中前进，但从旧时代沿袭下来的工业化、城镇化思路，始终被既往的发展模式所束缚。而这种几乎将全球划一的僵化模式，对于经历过不同历史发展轨迹，有着不同自然地理生态、不同社会生活与文化的不同地区来说，绝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这样说，直到我们找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以前，要完成黔中城市的近代化，始终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道路。即便以十倍的努力与百倍的勇气，要赶上先行了几个世纪的发达国家，不说遥遥无期，至少不可能如同今天这样：仅仅通过改革开放 30 余年，中国便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回顾清末以来黔中城市的近代化，不能说历史没有给这方土地带来种种机遇，但这些机遇要么与我们擦肩而过，要么一闪而逝。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黔中地区的近代化虽然一直在缓慢前行，但与国内其他省区相比，总是名列榜尾。以致我们常被他人引用历史上的“三言两语”<sup>⑧</sup>加以嘲弄，而我们自己也常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在我国境内，贵州的近代化启步是相对较早的。清末青溪铁厂的创办、经世学堂的诞生、当局新政的推行，已开始冲击封闭的高原山国，给民众带来了一丝摆脱旧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希望。1911 年，只响一枪便结束了清政府在贵州统治的辛亥革命，随之建立起来的大汉贵州军政府，更让老百姓欢欣鼓舞，无论绅商士民、实业界人士，似乎都有了黔中的近代化将可兴也的乐观。事实上，这些都应该是近代化的良好开端。问题在于腐朽落后的封建观念与专制主义体制，不可能给中国的第一座近代钢铁企业——青溪铁厂存活与发展的空间。完全属于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大汉贵州军政府，亦因贵州缺乏资本主义工业基础，导致资产阶级的脆弱，终于在滇军入黔的倾覆下只存在不足三月即告夭折，随之陷入的军阀混战。这一切，不能不

---

令黔人的近代化梦碎。

抗战时期黔中经济的突发性繁荣与战后的迅速萎缩，留给我们的最深刻教训应该是：如果自身没有储备好接纳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的条件，不能创造出良好的为近代工业企业、技术、人才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环境，不能将引进或迁入的先进生产力与本地的经济与社会有效融合，那么，生活在传统观念里的人们，将很难突破习惯性思维，获得“后发赶超”的优势。

黔中近代化的曲折历程还启示我们，在当今时代，不仅对于中国这样有着 14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需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对于几千年来始终处于落后状态的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黔中地区来说，更需要一条针对特殊喀斯特地理条件下，适合贵州高原山地环境的独特发展道路。如果我们寻找，到了这样一条建科学且切合贵州实际的道路，并将城市的现代化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么，通过贵州近 4 千万各族群众的奋发图强，“后发赶超”便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变成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现实。

#### 注释：

①厉以宁：《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2 页。

②《生态文明贵阳论坛》，贵阳，2013 年 1 月。

③李铁：《我所理解的城市》，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 页。

④（日）斯波义信著，布和译：《中国都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36 页。

⑤见范松：《黔中城市史—从城镇萌芽到近代转型》，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⑥柏学煮主编：《城市化与公共管理创新》，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 页。

⑦侯蕊玲：《论中国近代城市产生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

⑧李铁：《我所理解的城市》，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 页。

⑨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贵州省志·工业经济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 页。

⑩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 1939 年印，第 817 页。

⑪贵州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贵州财经资料汇编》，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 1950 年编印，第 58 页。

⑫“三言两语”：“三言”指历史上流行于民间的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两语”指成语“夜郎自大”、“黔驴技穷”。